

中东国家抗争政治的特点分析*

李 意

内容提要 抗争政治提供了民主转型的一个视角。根据查尔斯·蒂利的抗争政治理论,2010年底以来中东国家政局动荡中,体制外有一定认同感的集体行动者为抗争主体;客体为政府及其决策者;抗争目的是表达追求自由、民主、民生等公共诉求;具有对抗性、偶然性和创新性特点;并以媒体等信息技术的间接劝说为主。虽然抗争政治对于改变人们的政治认同、培育积极的公民意识以及构建公民社会等方面,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抗争政治与民主化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受制于民主与权威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中东国家要选择符合现实国情的民主道路可谓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抗争政治 中东 威权政体 民主转型

作者简介 李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83)。

社会稳定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长期以来,无论是关于社会冲突的研究,还是关于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研究,都吸引了众多学者进行分析和探讨。近年来,相对于“抗议”、“革命”、“社会运动”等概念,学者们越来越热衷于使用“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概念。抗争政治特指“政治上构建起来的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包括政府代理人提出公共的、集体的诉求”。具体而言,即处于从议会政治到暴力革命之连续谱中的民众广泛而间歇

*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中的伊斯兰因素”(11YJC81002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年校级规划基金“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与转型研究”(2011114038)的资助。

性的反抗、斗争活动；从和平请愿、纵火、抗税、抢粮、暴动到有组织的罢工、游行、集会乃至大规模革命都可称为抗争，这些抗争与国家政治的互动联系起来就是抗争政治。^① 2001年，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3位学者联合出版了《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一书，系统阐述了“抗争政治理论”，标志着抗争政治作为来自底层社会的运动，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民主转型理论体系。2006年，蒂利再次与其他学者合著了《抗争政治》，为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提供了政治过程的路径，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种社会和政治分析的清晰范式。蒂利指出，当权精英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很难也没有动力作为核心力量来推动民主转型，这是因为在威权社会里，没有任何一个威权者（当权精英）会主动地通过政治改革来改进结构推动转型。只有当一些结构要素被某些外在力量激活之后，它们才有可能成为威权统治的终结力量。^② 这就是所谓的抗争政治，它以民众的集体行动为核心推动力，强调自下而上的路径方式。

从2010年12月以来，要求建立民主政府的抗议浪潮从北非国家席卷中东大多数国家，抗议事件明显带有抗争政治的性质，因此也遵循相似的内在复杂机制。它充分显现出抗争政治在中东威权国家中的力量：执政多年的政治强人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相继在国内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和军方的压力下黯然下台，两国局势持续动荡；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被击毙，“全国过渡委员会”内部构成复杂、意见多元，难以形成合力；也门总统萨利赫被迫交权，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角力逐渐加剧；叙利亚抗议活动持续，牵动着国际社会多方神经；巴林、约旦、沙特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骚乱。抗议群众提出的重大政治要求包括总统或国王下台，政府改组公平选举，实行民众参政、保障民权与改善民生等。可以说，这一系列现象正是蒂利抗争政治理论在中东国家的具体表现。本文借用这一理论，从主体、客体、目的、形式和策略等方面来解读当前中东国家抗争政治的特点，旨在探寻其内在规律并尝试分析中东国家的民主前景。

^① Charles Andrain, *Political Protest and Social Change: Analyzing Politic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1995, pp. 56-72.

^② Charles Tilly & Sidney Tarrow, *Contentious Politics*,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7, p. 21.

抗争主体：体制外有一定认同感的集体行动者

抗争政治不仅具有历史厚度，更具有现实意义。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提出了“底层社会研究群体论”，并指出“以欧美历史经验为主所延伸出来的国家和公民社会架构并不足以描绘与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真实状况。现代国家在治理的过程中，发展出针对不同‘人口’群的治理机制，这个治理机制反倒提供了弱势人口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间。这些人口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为是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常规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过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①然而，人民本身就是政治人，他们必须担负起直接的责任，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从而推动政治决策的多元化发展，而抗争使得民众接近政治系统的可能性增多了。正如蒂利描述的那样，抗争政治的主体是集体行动者，同时也是体制外的参与者。由于抗争者不能够进入体制内通过政党组织模式或者利益集团来获得影响决策的机会，因此抗争是他们唯一的政治资源。抗争者为了特定的公共诉求集合在一起，形成了暂时的团结一致并具有一定的认同感，从而促成了政治抗争行为。^②简言之，抗争主体是来自体制外的具有一定认同感的集体行动者。

在此次中东剧变中，抗议群众皆来自传统体制外。体制外成员一般是指处在地方和基层远离权力中心的民众，即所谓的挑战者或者草根阶层，他们一般不具有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包括普通民众、部分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宗教组织和革命游击队等。普通民众可以加入抗争行动中，形成革命的洪流；新闻媒体可以传播社会抗争的诉求和行动，对政府构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社会团体可以通过资金支持、信息提供和组织支援等方式将社会抗争者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建立起联系。在一定范围内，这些体制外盟友的利益会趋于一致，在认同感上的隔阂也会逐渐减弱，从而联合起来，催生了中东国家民众的抗争行为。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君主制、家

^① [印度] 帕萨·查特杰著；田立年译 《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② Charles Tilly & Sidney Tarrow, *op. cit.*, p. 56.

族式统治和强人政权最为集中的地区，中东国家从“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之转型过程，既是一个矛盾重重的高风险时期，也是一个冲突迭起的结构调整时期。^① 特别是当财富愈益集中在少数上层群体手中时，其严重的分配不公会导致社会抗争动力不断增强。国家对部分经济部门的垄断和统治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控制，使大多数中东国家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难以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从而使民主化进程缺乏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这一社会结构使政府无法较好地回应社会，出现动荡在所难免。

中东动荡源于“草根”民众推动，上下结合，逐步升级演变。其抗争主体的情况不尽相同，如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抗争主体主要是年轻人。这些国家的人口低龄化现象非常严重，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60%。由于缺乏经济保障和制度建设，新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社会化过程并不完全”，困扰于失业和恐慌、犯罪和越轨、认同迷失和忠诚缺位等问题的年轻人形成了一个“危机人群”。在人口膨胀的年代，如何“接纳和教化”庞大的年轻人口不仅为政府和社会出了难题，也为国家的前景增加了变数。特别是在较低技术发展和教育程度的基础上，新增人口过快绝非经济红利。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和进入社会后的敏感和脆弱，导致他们往往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承载者和“受害者”。^② 在也门，大量高官的叛变加快了也门变局的步伐。在利比亚，除了抗议群众外，原政府高官、流亡海外人士等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叙利亚，2011年6月发生的“吉斯尔舒古尔血案”说明，由于政府对抗议群众采取了高压措施，矛盾逐渐扩散至军队内部，军队内部出现“大批逃亡、倒戈”，该血案正是军内哗变所致，当然也有境外势力对叙利亚渗透的可能。在上述抗争主体的推动下，中东民众表达了对自由、尊严和公正的向往。

抗争客体：政府及其决策者

抗争政治是与常规政治相对应的政治形态。蒂利指出，民主源于抗争。虽然非抗争政治——如布坎南和杜洛克强调的财政、税收与民主的关联、政

^① Ibrahim Elbadawi, *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 Explaining the Deficit*, Routledge, October 19, 2010, pp. 116-121.

^② 《中东为低龄化伤脑筋 美借机输出民主》，载《环球时报》2011年3月9日。

治参与和政治公开、利益表达与政治组织活动等——仍然构成政治活动的主体，但民主化却主要发生在社会关系的变化上。根据“解压阀”理论，威权国家中由于政治结构封闭，会在无意间推动社会抗争，抗议行为没有温和的选择，容易走向极端化，当权者和抗议者之间往往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① 抗争者的目的就是通过影响政府决策来实现抗争集体的公共诉求，这样，政府及其主导的政策决定就成为抗争政治中被要求改变的对象。

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之时，中东大多数国家却表现出在民主化进程中的迟缓性和滞后性。有学者指出，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正设法令原本死气沉沉的阿拉伯世界复兴。^② 20世纪50年代以来，阿拉伯人开展反殖民斗争，领导人有自己的立场，阿拉伯世界有自己的主张，他们还设定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反抗外国统治的任务。阿拉伯领导层曾经支持过一系列伟大的事业——泛阿拉伯团结、反抗西方国家、抵抗以色列，虽然不都是成功的，但都让阿拉伯人引以为豪。然而，如今它完全失去了斗志，各国政府没有明确和有效的方法解决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阿拉伯领导层是消极被动的，即使积极主动起来也软弱无力，这和阿拉伯阵营力量的下降密切相关。以埃及为例，早在动荡发生前，就或多或少地已丧失了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在伊拉克问题上不见踪影；对伊朗政策一直限于抗议、抨击和侮辱；在与叙利亚的较量中，在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力等等，均显式微。不管欧亚非三洲的政治版图发生多大变化，出现过多少风起云涌的人民运动，而大多数中东国家似乎更多地置身于这一浪潮之外。久而久之，社会成员过高的政治期望与政府的相对低能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造成处于转型期的中东国家不稳定因素逐步增加。

虽然抗争政治常常被看作是民主转型的推动力量，然而，民主化一旦发生，社会运动往往会接踵而至。有学者指出，“如果在民主化进程启动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脆弱，那么在从威权体制、独裁体制或是专制体制向有一定民主特征也有一定威权特征的混合政治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该国卷入国

^① Teresa Wright, “Organization, Mobilization,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Opportunity”,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Popular Contention in Chin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n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October 5-7, 2006.

^② Kourosh Ziabari, “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ab World?”,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3, 2011.

际战争的可能性是其他国家的4倍。”^① 国际战争暂且不论，这一推断说明两点：在政治体制较为脆弱的国家中，即开放与封闭并存的“中间状态”极易导致社会抗争；在政治开放度的两端，即在政治系统完全开放和完全封闭的情况下都不容易发生抗议。由于中东国家的政治体系具有典型的破碎性、脆弱性和可渗透性等特征，加之近年来，中东威权政体国家为顺应潮流进行了民主化实验，从原来的封闭政体转向一定程度的开放，这种介于开放和封闭之间的混杂体制最容易出现抗争，政府及其决策者因而成为抗争客体。

抗争目的：公共诉求

抗争政治之所以多发生在威权国家，原因在于他们的发起者及组织者认为，政治表达的常规性制度渠道已经堵塞。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威权国家要么选择突围重生，要么继续在不同的威权统治下循环。为了快速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威权统治采纳国家机器监控社会的基本方式。由于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制度的不断变迁，它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但原有统治中的既得利益者会采取不触及根本利益的措施来安抚社会，致使无法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需要。^② 于是，被压抑的民众采取反抗和斗争活动，其目标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某一特定的公共利益。随着认同感的增强，这一公共利益上升并扩散成为每个集体抗争者的普遍诉求。^③ 此次中东抗议浪潮明显具有追求自由、要求社会公平和推崇民族主义精神的三大特征，其中，公共诉求主要包括自由、民生和民主等内容。

对自由的诉求是中东青年走上街头的关键因素。中东国家的威权体制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初，确实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但随着全球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其弊端逐渐暴露，权力过分集中、自由民主的缺失等必然导致这些国家民众的不满。如在本·阿里时代，突尼斯人民是不能在公共场合讨论政治的。倘若有人在咖啡馆或饭店里议论一下总统或政府，就有被告发的危险，

^① Edward Mansfield & Jack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The MIT Press, 2005, pp. 32-51.

^② [以色列] S. N. 艾森斯塔德著；张旅平等译 《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③ [美国] 查尔斯·蒂利、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著；李义中等译 《斗争的动力》，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甚至被捕、入狱。埃及虽然是总统共和制，介于西方的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但在阿拉伯民众眼里，它已不能真正解决阿拉伯民众面临的一些问题，如贫穷、发展和言论自由等。因此，阿拉伯民众决心以“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干预国家的政治事务。

中东国家对民生的诉求也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中东国家本身吸纳和消化失业人口的能力较弱，发展也比其他地区更显滞后。特别是近年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恢复缓慢，安置就业、改善民生等都受到影响。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的高出生率、高失业率以及高贫困率已成为普遍问题。快速的人口增长并未伴随着经济的同步增长，导致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并引发一系列经济危机。可以说，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中东民众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现代化的成果，“尽管怀着对世俗民族主义某种繁荣的预言和乐观主义，许多人还是感受到或者亲历了现代国家大范围的失败的情况……权力和财富的集中使贫困问题更加突出，人口稠密和糟糕的教育状况也没有大的改进。”^①与西方国家的发达、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尚处于发展中的中东国家面临诸多问题。西方国家强力推销、本国精英极力引进的现代化，在实践中举步维艰。过分拥挤的城市、失业、社会失序和文化冲击却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有埃及学者曾指出“公民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会造成政治失稳。经济资源及其数量的不足意味着公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极易造成心理紧张，当他们发现摆脱这一困境的手段是改变政治制度时，他们通常会诉诸暴力，引发冲突。”^②这一系列问题可谓是引发中东国家抗争政治的导火索。

对民主的诉求体现在中东民众近年来争取民主的呼声愈来愈高，就连坚守君主制的沙特也无法再忽视民众改革诉求，2005年首次举行地方选举，不过投票权仅限男性；科威特在2006年让全国近20万女性首次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09年更选出首批女议员。纵观20世纪后期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它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体系的格局，然而，在100多个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中，只有20多个国家有效地建立了民主体制或者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

^① Alanoud Al Sharekh, “Reform and Rebirth in the Middle East”, *Survival*, Vol. 53, No. 2, March 2011, pp. 51 - 60.

^② Eric Zencey, “Growth of GDP and Discontent in Egypt and Tunisia”, *The Daily News*, March 8, 2011.

大多数民主化国家既非民主也非独裁。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选举民主的形式，却未能满足民主的实质，而是陷入了一个“灰色区域”。^① 这些国家具有一些民主政治的特征，如定期选举、有限的公民社会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公民权利遭到忽视、代表性不足、司法不公等。事实上，中东国家的总统通常是变相的君主，一旦总统权力在手，就竭力谋取连任机会。与此同时，政治强人在位期间，为了维持个人绝对权威，通常会抑制公民社会的发展，弱化立法或司法机构的权限，而这些正是高品质民主制存在的关键。强人政治之后，突然释放的大量矛盾，处于空前兴奋和高期望状态的民众，迅速膨胀的政治参与需求，暂无威信、又被迫小心翼翼取悦各方利益的新政府……都将使社会处于一段时期的失序状态。一旦应对不足，强人政治或军事独裁又会接踵而来。由此可见，对于中东国家来说，民主化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很可能遭受不断的回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动荡。

抗争形式：对抗性、偶然性和创新性

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抗争政治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它同传统的政治参与不同，主要是因为前者通常被现政府当局定义为处于社会常态制度之外。^② 由于抗争是不可预测的，其行动基本上是用非传统的方式来干预政府决策，因此，它又被视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的整合功能并没有强制性，往往是通过“唤醒”各种行为体的“道德良知”来扩大影响的。因此，抗争运用的方式具有别出心裁、非正统、戏剧化及争议性等特点。蒂利将抗争形式的特点归纳如下：第一是具有对抗性。抗争性集体行动使普通民众与对立者、社会精英或当局发生对抗。对抗不排除暴力，任何政治抗争行为都可能出现暴力形式，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方式，抗争政治逐渐趋向于非暴力化；第二是具有偶然性，它体现在政治抗争的间歇性和非连续性上；第三是具有创新性。他们的方式要么是从未有过先例的，要么是被现

^①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1, 2002, pp. 5 - 21.

^② [美国] 安东尼·奥罗姆著；张华清等译 《政治社会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存政权所禁止的，如联名签署、合法游行示威、抵制、拒交租金、静坐抗争、阻碍交通、非法罢工等。^①

具体到中东国家的抗争政治，它的形式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此次中东各国抗争政治的对抗性十分明显。突尼斯青年小贩布瓦吉吉被逼上绝路自杀一事，引燃了当地群众的愤怒，众多百姓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有所作为，并与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伤亡不断，总统本·阿里在一片抗议声中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阿拉伯避难；埃及首都开罗爆发全面游行，迫使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抗议和骚乱导致至少上百人死亡、上千人受伤；也门首都萨那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上万个示威者要求执政30多年的总统萨利赫下台；在阿曼，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停止贪污腐败；在苏丹，喀土穆和杰济拉大学的学生也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削减石油和食糖津贴；约旦和阿尔及利亚也发生了反政府示威游行；毛里塔尼亚、沙特阿拉伯在突尼斯摆摊青年自焚后，也相继发生民众自焚事件，自焚者藉此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这一系列事件都将抗争政治中的对抗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此次中东各国的抗争政治具有一定的偶然性。26岁的突尼斯青年布瓦吉吉自焚结束生命引发骚乱，在突尼斯骚乱的示范效应下，由于民众不满物价上涨、失业率高和腐败等问题，埃及多个城市发生民众大规模集会。此后，被西方媒体冠之以“阿拉伯之春”的抗议浪潮蔓延到中东大多数国家。普遍来看，这些抗争行为都来自偶然性的事件，充分体现了抗争政治的间歇性、非连续性、不定期发生等特点。

最后，此次中东各国的抗争政治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其关键在于如何运用策略来向媒体和更有影响力的行动者进行间接劝说。由于抗争是弱势群体唯一的政治资源，为了表达并实现公共诉求，他们往往运用各种策略来获得更多的认同，并设法打动那些有可能影响决策的体制内精英。抗争者们创造出很多标新立异的抗争形式，并积极扩大自己的抗争人员数量，通过传达一种文化上或道德上的感召力来打动媒体和决策者。与以往的情况相比，此次中东抗议事件中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动员可谓颇具创新性的抗争形式。

^① [美国] 查尔斯·蒂利，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著；李义中等译：前引书，第89～113页。

抗争策略：媒体等信息技术的间接劝说

动员是抗争政治中最为重要的过程。威权国家没有完整的公民社会，正式社会组织难以起到动员的作用，通常由空间布局和社会网络发挥动员结构的作用，并呈现出自发性强、组织化程度差的特点。蒂利指出，从地方性抗争转变为全国性抗争，包含了传播、居间联系和仿效3种机制。它的实现有两条路径：一条是直接传播路径，它通过一些个人和团体而形成，这些个人与团体此前已有的相互联系或彼此间的相似性构成了动员的基础；另一条则是中介传播路径，这是一条通过中间人将那些此前也许根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们联系起来的传播路径。^①在第二条路径中，抗争行动能否产生效果，媒体和信息技术的的作用非常关键。因为抗争者无法直接号召更多的大众支持者和体制内决策者，他们只能运用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力量来寻求更大群体的大众的支持，并通过媒体让决策者感受到他们的力量。

2010年底以来中东国家接连爆发的抗议事件中，“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网站成为作用突出的“助推工具”，西方普遍冠之以“社交网络革命”、“脸谱革命”或“维基革命”等名称。^②近年来，网络已成为中东国家民众获取信息、相互沟通甚至参与社会事务的主要渠道和平台。占该地区总人口将近50%的25岁以下年轻人成为网民主力，他们精通网络，深谙相关新技术和手段，构成了所谓的“网络一代”、“脸谱一代”。一方面，他们面临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封闭与开放、民主与独裁、理想与现实、宗教与世俗等矛盾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其社会交往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都打上了网络的烙印。便捷的网络设施及众多的网民，为社会变革的出现积蓄了软硬件基础，一旦与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和矛盾相碰撞，社会动荡就会全面爆发。

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的美国学者克莱·舍基指出，“社会性软件让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组建群体和共同行动的能力，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的阻碍被彻底消除。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人皆记’且实时协调代

^① Charles Tilly & Sidney Tarrow, op. cit., p. 119.

^② Brad Nelson,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the Middle East Uprisings”, <http://ahram.org.eg/News>, 2011-04-01

替了事前计划。”^① 舍基的思想在中东抗争政治中被不断印证：2009年6月，埃及年轻商人哈立德·赛义德被害的视频播出后，人权活动在脸谱上创立了“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网页，在脸谱、优兔和推特上的拥护者多达数十万，并最终成功号召埃及民众于2011年1月25日在解放广场开展示威活动；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贩布瓦吉吉自焚后，他全身着火的照片很快传遍互联网，这起“暴力执法”事件彻底点燃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利比亚，激进分子先是利用阿拉伯语约会网站，然后再通过手机短信、“雅虎通”等进行秘密联络，以躲避政府的网络审查；在叙利亚，网民早在2006年就开始了“青年网上非暴力行动”。

截至2010年末，中东地区拥有3.5万个活跃博客。当政府与反对派在街头对决的时候，互联网上的社交媒体成为双方的另外一个战场。面对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挑战，政府在传统媒体中的影响力荡然无存。政府只能通过技术手段来消除影响，如过滤关键词、封锁网站等，但民众仍可通过相关技术手段突破政府的封锁。信息的发展和传递影响着每一个人，也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政治和抗争形式。

结 语

在民主转型理论中，抗争政治被期望成为一种民主转型的重要路径。然而，在威权国家，抗争政治是否能够推动民主转型，还不能给以确定的答案。“民主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总是不完善的并且永远面临着被逆转的危险。民主离不开抗争的推动，但抗争政治与民主化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② 抗争仅仅作为转型的催化剂，能不能被激活，还要看复杂条件和机会的生成。只有民众抗争与政府互动能够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消除不平等，同时能够加强对政府的集体性约束、抑制专横权力，才有可能推动民主化。如果抗争政治没有激活或参与这些机制，或激活了相反的机制，那么很可能带来的是“去民主化”。可见，抗争政治作为一种理论虽具有共性，但不具有普适性。它提醒我们，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抗争和社会运动时，都不能脱离抗争

^① [美国] 克莱·舍基著；胡泳等译 《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② Charles Tilly & Sidney Tarrow, *op. cit.*, p. 133.

所存在的国家 - 社会关系和特定的政治结构。

中东国家的抗争政治是威权体制背景下的民主化过程，能否成功转型，需要综合考虑同一性与本土性、普适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协调，不能一概而论。更何况，我们绝不能忽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双叉性”（Bifurcation）特征，它有可能使中东国家反复地摇摆于民主化和政治封闭之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此次抗争运动与民主化浪潮的洗礼，未来在中东地区，无论是传统的君主制国家，还是现代的共和制国家，政治变革都将成为大势所趋；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国家体制中的民主因素都将大幅增加。

On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i Yi

Abstract: 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provides a perspective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lthough the protest itself can not directly br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 i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hanging people's political identity, cultivating their active citizenship and building the civil society. Relying on the basis of Charles Tilly's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ddle Eastern protests from the aspects of subject, object, purpose, form and strategies since the end of the year 2010. It argues that democrac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protests, but there's no causal link between them. To choose the democratic path in the Middle East is a long way because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hority.

Key Words: Contentious Politics; the Middle Ea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Democratic Transition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